

现代中国文学史

XIANDAIZHONGGUO WENXUESHI

主编 周晓明 王又平

湖北教育出版社

XIANDAIZHONGGUO
WENXUESHI



现代中国文学史

XIANDAIZHONGGUO WENXUESHI

主 编 周晓明 王又平

副主编 童秉国 张岩泉 孙志军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学史/周晓明,王又平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ISBN 7-5351-3953-1

I. 现… II. ①周… ②王…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587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430034·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1 插页 48 印张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770 千字

印数:1-4 000

ISBN 7-5351-3953-1/G·3260

定价:6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到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时危势急,几度转折,经历着从性质到结构的全面变革。这一历史格局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与流变模式。文学的演进,朝外,探索汇入世界大潮;向内,要求保持固有个性;往前,寻求文学与历史目标的同一、与民族命运的交融、与人民苦乐悲喜的紧密结合,民族化与现代化、革命化与大众化成为它的双向追求。

变传统文学为现代艺术,化异域营养为本土经验,现代中国文学在历史的合力中,立足时代与现实,积极探索,努力创造。它变革深刻——从审美观念到文学思潮,从文体形式到语言技巧,与传统文学判然有别,奠定了新型民族文学的基础。它成就巨大——在相同的时间内,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它意义深远——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留下了最为生动丰富的形象记录,并自身成为这一转型的有力动因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中国文学风雨兼程、荣辱一身。它以变革传统而承接古典、断裂旧史而书写新史的智慧胆略,为民族文学在现代时空续写了百年华章!

目 录

0 绪 论	(1)
0.1 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	(1)
0.2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	(5)
0.3 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	(12)

第一编 清末民初文学 (1895—1915)

1 清末民初文学:古典时代的终结	(23)
1.1 传统中国的全面危机与历史反应	(23)
1.2 现代文化观念的萌芽	(29)
1.3 文学改良——文学现代化的最早尝试	(35)
1.4 清末民初文学的历史轨迹	(41)
2 梁启超与章太炎:文学改良的倡导与超越	(42)
2.1 梁启超的生平与思想	(42)
2.2 梁启超的文学改良主张	(59)
2.3 梁启超的文学创作实践	(65)
2.4 章太炎的生平与思想	(71)
2.5 章太炎的文化文学活动及其影响	(78)

3	清末民初文学的现代性追求	(85)
3.1	新派诗	(85)
3.2	新文体	(93)
3.3	新小说	(98)
3.4	戏剧改良与文明戏	(103)
3.5	“林译小说”与早期翻译文学	(109)
3.6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	(113)
3.7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	(119)

第二编 五四时期文学
(1915—1927)

4	五四时期文学:走向现代的伟大转折	(129)
4.1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129)
4.2	现代文化观念的滥觞	(134)
4.3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141)
4.4	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149)
4.5	文学革命的艺术实践	(154)
5	鲁迅:五四文化文学的先驱	(161)
5.1	鲁迅生平、思想和创作概况	(161)
5.2	《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	(167)
5.3	《呐喊》、《彷徨》的思想和艺术	(173)
5.4	鲁迅前期杂感	(186)
5.5	鲁迅前期散文诗和散文	(195)
6	郭沫若:“五四”时代之子	(206)
6.1	郭沫若生平和创作概况	(206)
6.2	《女神》	(212)
6.3	从《星空》、《瓶》到《前茅》、《恢复》	(217)

6.4	郭沫若的戏剧	(224)
6.5	郭沫若的小说	(228)
7	五四时期主要文学社团流派	(235)
7.1	文学研究会与“问题小说”、“乡土小说”	(235)
7.2	创造社与“身边小说”	(242)
7.3	新月派与“新格律诗”	(248)
7.4	语丝社与“语丝文体”	(260)
7.5	“未名”、“莽原”、“湖畔”、“沉钟”	(269)
7.6	南国社及其他社团流派的创作	(279)
8	五四时期其他代表作家	(286)
8.1	胡适	(286)
8.2	冰心、叶圣陶、王鲁彦	(295)
8.3	郁达夫、冯文炳	(301)
8.4	徐志摩、闻一多	(308)
8.5	冯至、李金发	(317)
8.6	周作人、朱自清	(324)
8.7	欧阳予倩、洪深、丁西林、田汉	(331)
9	五四时期其他文学	(340)
9.1	学衡派与甲寅派	(340)
9.2	五四时期的通俗小说	(346)
9.3	五四时期的旧体诗词	(354)
9.4	五四时期台湾文学	(362)

第三编 30年代文学 (1927—1937)

10	3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多元选择	(374)
----	-----------------------	-------

10.1	30 年代的历史走向与文学走向	(374)
10.2	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	(380)
10.3	从五四文学到后五四文学	(385)
10.4	30 年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391)
11	左翼文学(上)	(399)
11.1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	(399)
11.2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403)
11.3	左翼文学思潮与论争	(407)
11.4	左翼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411)
12	左翼文学(下)	(417)
12.1	鲁迅后期杂感与《故事新编》	(417)
12.2	茅盾及其《子夜》	(425)
12.3	丁玲、萧红	(431)
12.4	张天翼、吴组缃、沙汀、艾芜	(436)
12.5	东北作家群	(443)
12.6	左翼戏剧、电影创作群	(449)
13	后五四文学(上)	(455)
13.1	后五四文学概观	(455)
13.2	京派	(462)
13.3	现代派	(470)
13.4	新感觉派	(478)
13.5	论语派	(484)
14	后五四文学(下)	(490)
14.1	巴金与《家》	(490)
14.2	老舍与《骆驼祥子》	(497)
14.3	曹禺与《雷雨》、《日出》	(503)

14.4	沈从文与《边城》及其他	(511)
14.5	李劫人的“大河小说”	(516)
15	30年代其他文学	(523)
15.1	30年代社会言情小说	(523)
15.2	30年代的旧体诗词	(529)
15.3	30年代国民党文学	(538)
15.4	30年代台湾文学	(543)
第四编 战时战后文学 (1937—1949)		
16	战时战后文学:现代进程的延宕与延续	(555)
16.1	战争与文学	(555)
16.2	战时地域分割与文学发展的区域化	(561)
16.3	战时战后文学文化、文学思潮	(568)
16.4	战时战后文学的基本形态和格局	(576)
17	延安与解放区文学	(585)
17.1	《讲话》的发表与文学思潮的转向	(585)
17.2	解放区的文学创作	(593)
17.3	民歌体诗歌与新歌剧、戏剧	(599)
17.4	赵树理及“山药蛋派”	(609)
17.5	孙犁及“荷花淀派”	(616)
17.6	丁玲、周立波的长篇小说	(621)
18	国统区文学(上)	(630)
18.1	国统区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630)
18.2	胡风与国统区文学理论批评	(636)
18.3	艾青	(643)

18.4	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	(648)
18.5	其他中篇小说	(654)
19	国统区文学(下)	(660)
19.1	老舍的《四世同堂》	(660)
19.2	巴金的《寒夜》	(665)
19.3	郭沫若的《屈原》	(672)
19.4	夏衍与《上海屋檐下》	(678)
19.5	战后讽刺诗潮	(683)
19.6	战后戏剧、电影	(689)
20	“孤岛”和沦陷区文学	(696)
20.1	“孤岛”和沦陷区文学概况	(696)
20.2	张爱玲	(706)
20.3	钱钟书与《围城》	(712)
20.4	李健吾等剧作家	(717)
21	战时战后其他文学	(724)
21.1	现代武侠小说	(724)
21.2	战时战后的旧体诗词	(732)
21.3	战时战后台湾文学	(739)
21.4	战时战后香港文学	(749)
后	记	(759)

0 绪论

0.1 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

这里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主要有四层含义：从空间范围看，它是发生在“现代中国”民族和主权国家之范围内的文学；从时间跨度看，它是存在于“现代中国”政治共同体之形成、演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学；从主体角度看，它是现代中国之国民为创造主体或接受主体的文学；从文学性质看，它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文学现代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并从不同角度有助于这种现代化之进程的文学。

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源流可从宏大视角把中国文学史整体认同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从狭义讲它仅指与现代中国文学相对关系紧密的此前文学史。本书的文学源流取后一种含义。

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学界至今研究不够。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那么现代中国文学与本土文学传统的源缘关系的探究则较为薄弱。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作出较早评述并引起较大影响的是周作人所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是他193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所作的讲演，并于同年9月由人文书店出版。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分为“载道”、“言志”两派。所谓“道”，指的是思想；所谓“志”，指的是感情。“言志”就是抒发情感。“载道派”和“言志派”作为不同潮流，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轮流占主导地位，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作为此前的前后七子复古倾向的反动而出现，是“言志派”取代“载道派”。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到了清代，他们被乾嘉学者否定，文学又向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发展，“载道派”又占了统治地位，以桐城派为其代

表。五四新文学反对桐城派,反对“文以载道”,又回到公安、竟陵的传统上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代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①周作人把几千年中国文学史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未必妥当。但他把晚明以来的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观念一直影响了后来的论者。

然而本书所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较之周作人从晚明又上溯到元代,以为现代中国文学直接源于元明清文学。“因为从元代以来与新文学相关联的变异因素的成长较为连贯和明显。”^②元代文学一开始就摆脱了宋代文学以理智态度自我敛约的特点,走向情感的活跃与解放。这一势头在明代前期约一百年间受到封建专制文化的强大抑制,几乎进入冰封状态。从明中叶开始,要求解放个性、积极表现自我的创造精神的文学思潮重新抬头,至晚明达到高峰,并获得丰富的成果。明末至清代前期,再次受到封建正统文化的反拨和抑制。但这一次却没有达到明代前期的那种效果,晚明文学的种种特点在低潮状态中得到顽强的延续。这表明中国文学中的变异因素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浸染人心,不可能加以彻底清除。如此延伸到清代中期,发展成一个新的文学高峰。从晚明到清中期,虽然经历挫折和起伏,文学发展的步履艰难,但所获得的成果都是巨大的,它给中国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李贽和龚自珍这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前后呼应,对封建文化的黑暗与愚昧发动了激烈的攻击。而龚自珍的思想与文学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意义上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三立、苏曼殊等人,启发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中国文学开始由古代传统向现代转型。

从戊戌变法时代裘廷梁提出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白话为“维新之本”,到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其必要的前提是白话文在中国文学本身已经有了充分的成长。虽然胡适把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范围定得很广,但应该说,只有到元代以后,它才成为比较有意识的创作,并且形成大致连续不断的史的进程。在广义的诗歌中,元代散曲较早大量使用了活泼的口语,直到众多明代散曲家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明中后期许多诗人对民歌俗曲的大力推崇,成为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这也反映了诗人对典雅的古诗语言和体式的不满,唐寅和公安派的部分诗作对此作了破坏性的尝试。清代诗歌虽以精雅为主导,然而像袁枚、龚自珍等诗人均有不少率意之作。到清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55页,人文书店1932年。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第62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末黄遵宪等人,更扩大了诗歌语言的自由度和白话化。

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的白话化程度逐步增强。元明以来的戏剧包含着大量白话成分,而白话小说的意义尤为重要。从元末的《三国演义》、《水浒》、明代的《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到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趋向是传奇性逐渐减小,故事情节突出了对人物的刻画,而人物性格越来越平凡和多样化。作者要藉此描绘出越来越富于真实感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场景,必须使用鲜活的语言,追求文字表达的生动、细致、形象。由此不断增强了白话运用于艺术表现的力量,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可靠的语言基础。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代中国文学的白话语言是从元明清以来白话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应该是不争的史实。

由于元代以来出现了半白话或准白话的写作,也一定带来文人思维方式的变化。有的论者从中国文学思想的阶段性推论出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认为从中国进入文字时代到先秦时代的文学思维为“单文思维”(即指思维材料以单个文字为主体的文学思维)从两汉以降到唐宋的文学思维为“合文思维”(指思维材料以单个文字与组合文字相结合而进行的文学思维)。元代方登大雅之堂到明清以来为“语文思维”的时代,所谓语文思维指思维材料以口语与文言相互结合并能描述语言的思维。语文思维材料既非纯粹的口语也非纯粹的文言,它以口语为主又吸收了大量文言,是一种“雅化”的口语。其“雅化”的程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减弱,即愈古愈雅,愈近愈口语化^①。

文学思维的变化引出文学思想观念的变革,从元代开始,文学中就有很多新的因素出现,但文学思想方面某些鲜明的革新主张到晚明才形成。从李贽的“童心说”到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说”以及汤显祖等人的“尊情说”,都是把文学视为真实的个性与情感的自由表现,而排斥一切与之相对立的因素——包括服务于政教的功用、通行的知识与道理、文学的典范与法度等等。“真”、“奇”、“趣”一类纯粹是审美感受的价值标准被提到首位(戏曲、小说、民歌等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类型在这时受到高度重视,也与此有关)。“载道”的文学观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文学发展的合理方向,经过晚明可以说变得明确了。到清代像袁枚之重倡“性灵”、龚自珍之讴歌“童心”,都是晚明文学思想的延续。这

① 参见刘晓明:《“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些文学思想是导致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观念的文学理念的传统。

现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的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特征是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肯定人的生活欲望和人性的自由发展。较为突出的表现为反抗专制批判礼教,要求恋爱自由男女平等,自我张扬以及对下层民众生存状态的关注。这表现在作者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在元明清是连续不断强化的。在元代杨维桢诗文对自我精神形象的夸张性描述中,在高启诗文经常表现出的无端的惊惧中,都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层心理上的自我觉醒,而明中期产生的基本内涵仍颇为陈旧的阳明心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以内在“良知”并合外在“天理”,在理论形式上把确认真理的权利交还给自我。晚明李贽由此引申出他的异端学说,蔑视六经,声称“不知孔子何自可尊”,掀起了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权威运动。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把他的文学前辈,一生潦倒的徐谓描绘成一种新的时代英雄,也是着眼于他不肯依傍任何人的“王者气”。这一趋向在龚自珍那里有了更强烈的表述:“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知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领彼久定之云?”这意味着,在个人作出“心审”之前,没有任何“当然如此”的事实。所谓“天地之久定位”是儒家学说中君尊臣卑之类的“纲常名教”的基础,可以看出龚氏思想内在的强大冲击力。尽管因长期的专制历史造成的压抑深重,但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意识是不断增长的。

与此相适应,中国文学从元代开始,文学创作表现世俗生活欲望的内容显著增长。到了晚明,“好货”、“好色”为人性的合理要求,成为鲜明的思想内容,继而延伸到清代。以自然情性排拒非人性教条压迫的作品,构成了元明清文学区别于前代(尤其是宋代)文学的显著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且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最明显的是一系列肯定情欲,赞美爱情的作品,“情”和作为其基础的“欲”原本是人性中最活跃的因素,它在文学中的活跃,直接表现了对人性和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以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晚明文学而言,《金瓶梅》可以说是以邪恶的形态反映了“欲”的不可抑制,而在《牡丹亭》、《西厢记》等戏剧和“三言”、“二拍”的一些小说中,爱情和情欲则被当作受压抑的生命自我肯定的力量来歌颂。清代文学不像明代文学那样粗犷,但在《红楼梦》以及龚自珍等人的诗中,对情的赞美与向往,也是为在社会中不断丧失的自我保存最后一片天地,与现代中国文学是血脉相连的。

0.2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可划分为现代转型期、现代构型期和现代定型期三个历史时期。

现代转型期：新旧传统转换的复杂历程 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广义地说，这种转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历程相始终，因而可以说这种转型至今尚在进行；狭义地说，则仅指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这一段中国现代化加速的时期。本文所谓“转型”取后一种含义。

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它由古代传统向现代转型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旧传统自身的矛盾，这是内在根据；其二是受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外在条件。自明中叶以后，中国文学明显地由抒情言志的文学向叙事的文学转变。李白、苏轼、柳永这样的诗词方面的才子为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这样的戏曲小说方面的才子所取代。即便在戏曲内部，也是更为体现古典诗词意境的典雅的昆曲渐趋衰微，而被称为“花部”的更为通俗、更接近生活的地方戏大为兴盛。市民逐渐成为和士大夫一样的文学欣赏主体之一。由于文人不可能以其创作的小说戏曲获得功名，从而使文学从某种程度上向着自身回归。中国古典文学向来讲究“文以载道”，文已开始转变，道又如何呢？明后期有个海瑞，此人是儒家道统的彻底实践者，也是其理想人格精神的完美体现者。他的结局是被皇帝保留一个高贵的虚职而不让他担当实际的工作。皇帝说他“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①。那么“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②。当一个社会普遍对其遵奉的道德伦理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时，这种道德伦理作为一种传统所拥有的令人敬畏和服从的“克里斯玛”特质就要开始折扣了。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同样，即便没有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也将逐渐衰落，新的传统也将逐步形成。这是由旧传统的内在矛盾决定的。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加剧了中国旧传统的内在矛盾，也加速了它的自我否

① 《神宗实录》，第3188-3199页。

②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0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卷》（合订本），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

定。首先是以大刀长矛等冷兵器为代表的器物文化传统被否定,接着是以君主专制为代表的制度文化传统被否定,最后,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人低下的素质才是造成落后局面的更为本质的原因。梁启超说:“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①;“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②。所以,正是以国民性改造为连接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传统的变革。这个切入点对今后新文学传统的形成影响深远。这也正是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所谓的现代化之第一阶段: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的时期。

在中国文学传统转型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种模式,即文学改良模式和文学革命模式。我们知道,传统之所以为若干代人所继承和信仰,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神圣的克里斯玛特质(Charisma)。中国人几千年来面对“夷蛮之邦”时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充分说明了对传统的敬仰、服从,说明了中国旧的文化传统所具备的极为强大的克里斯玛特质。中国文学也有着由一系列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传统。然而,这一时期,随着中国人在文化上优越感的丧失,文学在表现现代生活、揭示现代人的心灵等方面也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暴露出很大的弱点。但是,这时候,政治上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在文学问题上都是采取改良的态度的。从思想内容上说,主要是从“新民”入手,倡导“国民”群体意识,在着重于文化承传关系的前提下调和“东”“西”,实行“渐变”;在文学形式上其主张则可以用他们提倡的“旧风格含新意境”(维新派)、“须从旧锦翻新样”(革命派)来概括。总之文学上是力图在传统文学内部进行调整变通。比如林译小说,之所以大受欢迎,既源于对新的艺术世界的介绍,也源于对读者既有语言形式审美习惯的迎合。而革命模式产生并在制度文化的层面上付诸实践后,严复、康有为等就产生了某种“复古”的意识,其目的在于恢复社会秩序,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分裂的社会共同体是不可能强大的。

到了五四时期,则不仅觉悟到在破除制度文化的传统之后,还要破除精神文化的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以个体意识取代了国民群体意识,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性解放,并将以人性的追求和解放与对民族灵魂的改造和重铸结合起来;在文学形式上,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就是从破除古代书面语言僵死的语言体和文学形式入手的。在提出思想革命后,又把传统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冲破了数千年凝结着我国传统文化深层价值观念的文言文符号系

①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梁启超选集》,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梁启超选集》,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统,改造了文言文所负载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论等传统的结构形式。与“五四”语言变革紧密联系的是文体的变革。“五四”文体变革已经深入到语言体式 and 语象世界的深层结构之中。这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是如此。当然,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学传统的一种模式也有它自身的弊端。这就是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着因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带来的一些缺陷。这已经为近几年来许多学者所指出,这里就不必赘言了。总之,无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都各有利弊和成败,这里充分显示出现代中国文学传统在形成中新旧交替的复杂性和回环性。

现在,讨论改良与革命的孰是孰非成为热门话题。文学革命的确有其不成熟之处。所谓“激进主义”、“全盘西化”在新文学的建设上也不乏负面作用,并给以后的文学发展带来了一些隐患。事实上,当某种文学因素被整合而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时,多少会因为被赋予了那神圣的特质而异化。旧传统的消亡可以使其中包含的诸因素获得还原和自由,而被新的传统选择吸收。比如古典文学中的中和之美,我们所反对的是作为必须遵循的传统的一部分的中和之美。因为此时它以无尚的权威压抑我们对生活的感受,甚至有时发展为虚伪。当它失去了神圣光环后,反而以其本来面目赢得我们的喜爱,并成为我们的选择之一。当文学改良的倡导者过分强调传统的内聚性作用和共时性特征时,不妨回顾一下西方的启蒙时代。启蒙主义之前的西方是以宗教传统为克里斯玛,为凝聚社会的纽带。故西方张扬个性、尊重人权,即从反宗教传统入手。卢梭、伏尔泰都曾被教会指斥为伤风败俗。文学在西方并不处在整个国家精神意识形态系统的核心位置,故而西方只有宗教革命而无文学革命。而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伦理道德的传统、政治秩序的传统是三位一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三位一体就是中国的克里斯玛,在中国起着和当时西方的宗教同样的统治与规范作用,就是中国的“宗教”。所以,在现代化进程的某个特殊阶段和“临界点”,也要进行中国的“宗教”革命。

现代构型期:“五四”克里斯玛特质的开放性与变异性 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相辅相成,形成了“五四精神”。“五四就好比是给中国现代历史打上了一个结,此前的种种历史线索都收拢于此,此后的种种历史线索又都发端于此。”^①这是一个中国文学新传统的现代构型期。“五四精神”是中国人精神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是自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创造探索的精神能量经过积聚以后的总爆发。它具有构建新传统所必需的超过旧传统的双倍的克里斯玛特质,它不

① 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